

2023年9月8日  
星期五  
责任编辑:朱 洁  
美术编辑:左 骏  
校 对:谭智方

有奖征文



## 真感幸运

谭国斌

我是一个医学上被“判处死刑缓期执行”的对象,因为我是肝癌术后患者。2014年12月5日,我在株洲市二医院做了肿瘤切除手术,时近九年,我还活着,真感幸运。

我之所以有今天,首先要衷心感谢市二医院外科杨志伟和肿瘤科邹利乐等医务人员,是他们用精湛的医术和真诚的服务,让我充满战斗的勇气,也因此获得了第二次生命。

2014年10月13日,我在体检时发现罹患肝癌。这一刻,我呆了,全家人也懵了,惊慌、茫然、焦虑……

待我从惊恐中冷静,准备选择后续治疗方案时,我的家人又意见不一,他们有的赞成手术切除,有的建议进行保守疗法。因此,我召集他们开了个家庭会,讲述了自己的三个观点:一是要相信现在的医术;二是要相信我有战胜疾病的能力;三是即使手术有意外,请大家不要悲伤,因为生老病死,乃自然规律,我父亲58岁去世,而我已年过70岁,接近全国平均年龄,死而无悔也!家人见我心意已决,便依我的决定办。

2014年12月1日我住进了株洲市二医院肿瘤科,主治医生是邹利乐,他和外科杨志伟医生等对我的身体进行了评估,先后做了心脏、肺部等器官的检查,最后决定12月5日做肿瘤切除手术。上午8时,护士用手推床将我推入手术室,手术室里有三个医生四个护士,他们穿着白大褂,戴着口罩和手套,严阵以待,一副战斗的姿态。我立即说:“大家好!要辛苦你们了!”他们齐声说:“没什么,这是我们的职责!”接着,一个医生说:“谭老,你心态蛮好,加油!”我说:“命运是注定的,一是相信你们高超的医术,二是我相信自己有战胜疾病的能力,即使下不了手术台,也绝不找医院的麻烦。”他们都笑了。

手术做了三个多小时,我的肝切去了将近百分之五十。术后,医生告诉我,术中他们为我先后输了两次血。住院时,邹利乐、杨志伟两医生每天上午和下午都会来到病床前,问寒问暖。杨志伟医生每天帮我检查刀口愈合情况,亲自为我换药;邹利乐医生根据我的病情和身体状况精心为我处方配药,他们经常给我精神安抚和鼓励。我问他们,我这病后续如何治疗为好,他们告诉我,做介入治疗最好,即通过动脉血管将药直接注入肝上,以清除杀死肝上的癌细胞,并告知,术后20天开始做介入治疗效果最好。我因术后身体太虚弱,走路脚抬不起,讲话提气不起,便提出回家调养一段时期再来做介入治疗。他们同意了。

12月20日出院时,他们给我办好了出院手续,开好常服用的药,并反复交代,要按时服药,调理好饮食,注重锻炼,保持乐观心态,一个月后一定要来复查等。那些叮嘱非常细致,让我和家人很是感动。

一个月后,我去复查,发现各项指标基本正常。此时,我的医生告诉我,可暂不用做介入治疗,服药再观察一段时间。又过了一个月,我再次去复查时,邹利乐医生和杨志伟医生告诉我,我的各项指标正常,依然不需要做介入治疗,并帮我换好了药。他们告诉我,我服用的斑蝥胶囊有毒性,既能杀死癌细胞,也会杀死好的细胞,所以他们又给我换了提高免疫力的乌苯美司片等。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有节奏的复查。一个月、三个月、半年、一年……每一次的复查,他们都仔仔细细,会细节到我的食欲、大小便等情况,同时也详细为我讲解报告单上各项指标及注意事项等。

我很幸运,因为,这么多次复查,我的癌胚抗原的指标一直在正常范围内。医生们笑了,我也乐了。我一直坚持遵医嘱服药、合理膳食、生活有律、注重锻炼、放松心情。现在,我感觉自己身体状况良好,九年抗癌自坦然,虽年近八十,但我还要继续努力,与阎王爷抗争,争取再活九年,甚至更长的岁月……

现在,我每当回想起自己治病的经历,就感慨万千。我感激市二医院的医务人员,也点赞自己,感恩今天的我还健康地活着。

## 征稿要求

- 1.除诗歌外题材不限,字数1200至2000字为宜。
- 2.文章要求真情实感,见人见事,不要大话、空话、套话,同时附上作者联系方式。
- 3.投稿邮箱:420918118@qq.com。
- 4.奖项设置:一等奖1名,奖金3000元;二等奖2名,奖金2000元;三等奖5名,奖金1000元;优秀奖奖10名,奖金500元。
- 5.活动时间:2023年2月至2024年2月。

记事本

## 永远的想念

贺新民

我父母亲是平凡质朴的农民,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,却有着不平凡的人生经历,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。

我的父亲生于1930年,享年75岁;母亲生于1933年,享年70岁。他们都是苦命人。父亲三岁时,爷爷就为革命牺牲了,留下了28岁的奶奶和三个不到10岁的小孩。母亲出生也很贫寒,并且屡遭不幸,五岁时,她父亲病亡,十岁,她的母亲双目失明,她被迫做童养媳。

(一)

1952年,两个苦命人组成了家庭。为了维持家人的生计,父亲胆大蛮干,经常一份力气累出几份成果来。小时候,我看见社员挑粮食到公社粮仓去(彭家祠,来回20余里),别的男人挑一担谷,只有我父亲一次挑两担谷。当别的女人用小箩筐挑粮食,而我母亲跟男人一样用大箩筐挑粮食,一担就是60多公斤。

上个世纪60年代,我父母亲打算在麻岭山建一栋房子,自己做砖烧窑。那时交通不方便,什么东西都得靠手提肩挑。当时做了两万多块砖,需要二万多斤煤才能把砖烧成红砖。要把这些煤挑回来就得走上两百多个来回,来往一次要耗费近三个小时。父母亲白天挣工分,早晚挑煤炭,这样连轴转的辛勤劳作,所付出的体力和健康的代价只有他们自己知道。砖烧成后,伯父家改变了建房的地点,我家跟着一起也把房子建在下如。这样一改,劳动量倍增。把这两万多块砖从麻岭山挑到下如建筑工地,我母亲就得走近两千个来回。可以说,建房子这几年他们每天夙兴夜寐地劳动,几乎毫无例外。一般人面对搬运两万多块砖就会一筹莫展、举步不前,但他们用不屈不挠的意志和流汗流血的劳作,铸就了自己的梦想。

(二)

父亲上班很辛苦,但为了能让小孩子过好日子,他在金湖挖钙砂时,从来没有空而归,要么挑50公斤钙砂到秧田收购站,要么背些木材回家建房。记得有一天下班后,父亲独自翻山越岭步履维艰,花了整整一夜时间把一根100多公斤重的木头从金湖背回到家,第二天吃完早餐又返回金湖秧田矿上班。他下班后的那点时间也从不过,经常开荒造田,抓鱼捉虾,放火狩猎。记得一个晚上,电闪雷鸣,风雨交加,一个多小时的暴雨造成塘水和溪水四溢,江边的农田与江水连成一片,从远处看去,一片汪洋。这时,我父亲不是害怕,而是发现了契机,立即点燃带有松脂的薪柴,背着背篓和斗笠出发觅食。

我问父亲,为什么打这么大的雷,下这么大的雨,涨这么大的水,还出去钓鱼?他说像这样的天气鳊鱼会上水,下面的鳊鱼咬着上面的鳊鱼的尾巴,成群结队往上游,运气好的话会遇上。只要抓住领头的鳊鱼,其他鳊鱼就会顺势进入篓中,成为囊中之物。父亲出去钓鱼后,我们就上床睡觉了。第二天一早起床后我发现着实一脚盆的鳊鱼,我高兴极了。想必昨晚父亲真的遇见鳊鱼上水了。

母亲很能干,也很坚强。她平时一天的工作安排得满满的,除了赚工分外,还要照顾6个小孩的生活起居,搞点修补、养殖业和种植业,以减少添置费用。生小孩是女人的一道关卡,但她生小孩后也顾不上休息。我十五岁那年,母亲生小弟时,父亲在外打井不在家,她竟没有请接生员,独自一人在火堂旁把孩子生下来,并把小孩洗干净,穿好衣服,搞好家里卫生,没有休息。

(三)

1955年建三间土砖房时,大弟刚好出世。母亲生大弟后的第二天就投入工地劳动,挑土砖。

我母亲一生建了四次房子。每次,母亲夫唱妇随,跟着我父亲挑砖担瓦做小工。劳累压垮了他们的身体,我母亲在四十多岁时就积劳成疾,隔三差五上医院。我母亲的劳累和病痛的样子时常出现在我脑海里,尤其是当我一个人在夕阳西下时,不禁泪目。为他们分担点什么就成了我每次回家的必做题。

记得有一年我家第三次建房时,我跟母亲上八斗冲砍柴。不小心,我踩在柴架上,差一点把脚板戳穿了。我用两只手把脚从柴架上拔出来,但撼不动。后来我母亲跟我一起用力,才把我的脚从柴架上拔出来,我母亲当即找了些草药敷在上面。回家时,我还是坚持挑一担柴。大概走了200米,因失血过多,我眼前变得一团漆黑,连太阳也黯淡无光了。我只好躺在路边,意识也不是很清楚,隐隐约约看到一个弯曲的身影,那是父亲——在漆黑中走了一宿才把百余公斤重的木头背回家的身影。每当我遇到困难时,我父母亲劳累的画面总是出现在我脑海里,给了我战胜一切困难的信心和力量。随着意识逐渐恢复,我坐起来再休息一会儿,咬着牙关把柴挑回家。下午,我坚持去拉锯。不幸的是,我的脚又不能动,用双手也搬不动,只好坐下来休息一下。稍好一点,我继续拉锯。

他们劳累的画面也成了推动我向上的精神财富。每当我学习工作上遇到困难时,只要想起他们,我就潸然泪下,感激和感恩之情油然而生。作为儿子,我没有让父母失望。我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,工作卓有成效,成为茶陵县史上普通教师中第一个中学特级教师,也是株洲第二个英语特级教师。

我收获的一切离不开他们的关爱和鼓励,更渗透着他们的心血和汗水。他们的精神将永远是我们工作和学习的动力源泉。

散文

## 我的启蒙老师

明腾

当二哥已上学,享受着风塔小学那高大桂花树散发出来的沁人心脾的清香时,我还在花木楼那窄幽的小巷,和小伙伴们玩着悲壮的“埋人”游戏:晓华傲娇地敲响他那牛皮小鼓,我、德威、胜仔和张勇等六七个同岁的玩伴,各自从家里偷拿来锅盖之类的家什,屁颠屁颠地跟着,走街串巷、敲鼓打打、浩浩荡荡。

玩乐的队伍来到那高高的楠木树下,来到了一扇小小窗户外,差不多就玩累了,就会进得屋去,围住主人庆其爷爷,听他讲故事。庆其爷爷(其实是伯伯,儿时称爷爷)是花木楼张家庞大家族中少有的读过私塾的老先生之一,除了满口之乎者也,还有讲不完的《聊斋》《水浒》和《西游记》。更有味的是他满脑的无穷无尽的谜语,例如“对面路边一只磨,皇帝老子不敢坐。”——谜底就是路边那硕巨大的新鲜牛粪。还有“对面屋里一口井,虾米鱼儿一大片(乡音念piang,四声)”,谜底我就不说了,70年代的人自然秒懂。

庆其爷爷的故事实在是听着入迷,谜语实在是启人想象,引人入胜!伴我度过许多快乐的童年时光,也引发我对文字的特别兴趣。

之后,就到了那株高大桂花树的势力范围。第一天去报名,我很怯场,望着老师办公室,就是不敢上前去,直到父亲将我领到一位周身母仪之气的女老师面前。

女老师笑容可掬、和蔼可亲,一下子就挫掉了我所有的胆怯,她就是我的启蒙班主任老师陈礼英。陈老师皮肤白皙,声音甜美,她把“a、o、e、i、u、ü”教得就像“东方红,太阳升”那样朗朗上口,深入人心。因为铅笔字写得端正饱满,每次举手回答问题,也是积极响亮,我很快就当上了班长,成了陈老师的得意门生。那个年代,做老师的得意生有很多烦恼,例如琼姑娘等就很不惯,喜欢组队远远地对我唱“民谣”:“得意生,洋得意,想里老师个大衣穿”。但唱归唱,后面二三年级用钢笔时,她却总是舍近求远,跨过横亘于我们中间的几个小组,到我这来借蓝墨水,而且往往因为笔尖对着笔尖,这蓝墨水到底是借了两滴还是三滴,总要争论很久,才有定论。

小小说

## 红领带

刘正平

脑后的马尾发一甩一甩的,她领着公公登上三楼,走进一套两室一厅的住室,指点着说:“爹,壮壮住这间,你住前面那间。”

他这里摸摸,那里瞧瞧,冰箱、电视、洗衣机、床、桌、椅等电器,家具一应俱全。感叹道:“方便,只是房租太贵了,我种一年菜也赚不了这么多钱。”

“钱,不用操心。你的事就是照顾好壮壮,时间很宝贵,过几个月就要高考了。”她叫他脱下那件皱皱巴巴的老中山装,从身边的大挎包里取出一套新衣,帮他穿上,正正衣领,将将领带,抻了抻袖口和衣襟下摆,啧啧不已:“蛮好,蛮好。”这是一套藏青色的西服。他穿着怪别扭的,直喊穿不得。

“咋穿不得哩?在这里又不用下地干活,要穿戴大方一些,人精神精神的,心情都好些。”

壮壮他爸在工厂打工,她在工厂旁开了家小店,两口口都脱不得身,只好叫老爹给壮壮陪读。

他每天的工作很简单。天蒙蒙亮,去楼下的小吃摊上买来早点,把壮壮叫起床,再擦地板、抹家什、冲厕所、洗衣;把一切都收拾好,换上这套西服,去市场买菜。这真是活受罪。早春的天气怪冷的,衣领这么敞开,胸口冷飕飕的,尤其挂在颈项上的红领带,像条狗尾巴似的晃来晃去,很闹心。他只把它当作道具,出门才穿上,进屋即脱了。

学校附近的小河边有个小市场,挨挨挤挤地摆着一排排菜摊。他闲着没事,常在菜摊边蹲着,和菜农聊天。都是同行嘛,谈一些“种菜经”。最看不惯那些买菜的婆婆妈妈,那么鲜嫩的菜茎,还拿着掐头去尾的;好好的萝卜、芋头,也要挑来选去,表皮不光洁、长得不对称的都不买。你是买着吃的还是看的呢?再好看也不能囫圇着吃吧,还得切成片或丝,炒啊。

卖菜时,老觉着菜价太便宜。现在要从衣兜里掏钱买,又觉着菜太贵。他专买那些被人挑剔的,几块钱可以买一小堆。

他每天都为买菜绞尽脑汁,鱼、肉、鸡蛋、豆腐是常备的菜。小祖宗难侍候,嘴巴娇得很,这也不好,那也不好,还埋怨菜炒得不好。吃饭就像嚼苦药,愁眉苦脸龇牙咧嘴的。

儿媳来电话了:“爹,你买些龙虾、青虾、牛肉、鲈鱼什么的,换换口味。”

这免崽子向他娘告状了。这些都是富贵菜,贵死人呀。他倒抽了口气,不敢告诉她:前天,班主任登门了,说他上课玩手机,成绩滑坡。叫她知道,反会责怪他:都是你惯坏的!

十几年前,将家伙被抱出产房的情形还历历在目,一家人见着他两腿间有个小鸡鸡,就像天上掉下

风塔小学的校长,是一身精瘦的谭望哲老师,一双浓眉之下,那炯炯有神的双眼,自带摄人魂魄的威严。谭老师家就在小学旁边,很近,我们甚至上课时都能听到他在家训斥自己孩子的声音。

小学放学时,是按生产队的学生为单位列队有序离校,在学校大门口的晒谷坪里,温水、桐源等最远的学生站最后一排,最近的村里就站最后一排。列好队后,值班老师站在屋檐下的滴水台阶上训话,总结一天情况。训完话后,再依次离校。印象深刻的是,谭老师讲话往往出口成章,叫人过耳不忘。例如那个下雪天的周末,他说:“同学们啊!今日星期六,大雪纷纷落,桥上过不去,双手爬得过!”提醒温水、桐源、库前那边的学生,过河的木桥上结冰了,桥面很滑,要放低重心,手脚并用爬过去。他这首打油诗张口就来,学生们嬉笑学舌了好久,自然也达到了提醒安全过桥的目的。

当年的小学,老师基本上都是本大队的民办教师,除了在学校上课,都要兼顾家中农活,而且大多数还是家里的主劳力,老师们只好每天家里学校来回跑。张明长老师教我时,应该就是处于这一阶段。他和我一个生产队的,所以上放学的路上经常会看到他的身影。那时,我已读小学高年级了。明长老师身材微胖,平易近人,终日笑容可掬,他上起课来往往天马行空,离题万里。记得有一次,他忽然来了兴致,竟然起了对联,而且上联就是那著名的,倒念顺念都一样的上联:“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”。虽然我们乡村的小学生无人能对出下联,却大大激发了我们对语文的兴趣,时光虽已过四十多年,我却依然清楚地记得,张老师当时对出的下联是:“北京阴阴阴阴北京北”。

后来,张老师和我们玩起歇后语来,什么“猪八戒吃西瓜——倒打一耙”“草帽子冒边——顶好!”“袜子冒底——上好!”等等,非常接地气,而且形象易懂,叫人一学忘不。

现在回想,我对文科有特别的偏好,对文字有特别的兴趣,大约就是起源于风岭脚下,起源于风塔小学,起源于我儿时的启蒙老师们。

了个月亮。断肠后,儿子儿媳一同去了广东,将小傢伙交给他老两口带养。就这么个小小孙孙,含在嘴里怕化,捧在手上怕碎。老伴去世那年,他才上小学。以后就全由他一手带养,天天巴望他快快长大。没想着越长越大,越麻烦。

前年,他中考落榜,只能上这所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。显然,高考的希望渺茫,还得去给他找一所民办大学,拼死拼活砸锅卖铁也要让他混一纸大学文凭。花的钱,他一辈子都用不完。

没多久,手机又响了:“这是人吃的吗?留着钱干吗哟?”他两眼发黑,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原来,这免崽子来了一手更绝的:把他买来的那些断枝残叶的青菜,和歪瓜裂枣状的萝卜拍成照片,发给他娘。天下的冤枉啊。他愤愤地答道:“这小祖宗我侍候不了。你自己来吧吧。没用完的钱,我带不进棺材,全给你。”

高考越来越近,班主任责问的电话越来越频繁。壮壮妈只好将店铺低价转让,匆匆赶过来。

如释重负,他即收拾行李回家。壮壮妈送他到车站,掂着个大挎包走在前面。他拎着小提袋跟在后面,想起了小提袋里红领带。那天,找翻了天都没见红领带,今天才发现压在衣柜角落里。没卖也罢,留着也大有用场。

可驱驱鸟帽。眼下正是谷雨季节,回去就要种花生。坡地里的鸟儿太多,白生生的苗芽一出土,就会被鸟啄得七零八落。将鲜红的领带扎在小竹竿的顶端,竖在花生地里,随风飘动,如熊熊的火炬,很有震慑作用。

还可做腰带儿,好看,柔软不勒手。在山沟里那个锣鼓班里,他是打鼓的好手。乡间凡有红白喜事就请他去打鼓。铜鼓形如圆碟,背部凸出一个乳盘状的半球。把这红带儿剪成两半,带头上打个结,穿过半球正中筷子尖大的孔,指头挽着带子,掌中半球,两片钹儿互击,锵锵地打起来。红带飘飘舞舞的,也平添了几分气势。

他看着壮壮妈的马尾发在脑后一甩一甩的,有些零乱,突然觉得还是给她扎头发好。是她买给他的,应该物归原主。

领带和衬衣配套的,咋能扎头发呢?儿媳觉着太不对劲,心里一咯噔,问道:“衬衣呢?”

“卖掉了。不恰身,不保暖。”

“卖了几多钱?”

“六十元。”他沾沾自喜,觉得碰了个慷慨的买主,说六十元就给了六十元。

“花了一千多块钱买来哟。”她气得直跺脚,“你呀你……”